

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中的“情结”分析

——兼论“钓鱼台”问题

廖中武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福州 350001)

摘要: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台湾当局与日本之间建立了正式的所谓“外交关系”,日本国内形成了“台湾帮”,出现了严重的“台湾情节”。与此同时,台湾也出现“日本情结”,即便在日台当局正式断交后,二者仍藕断丝连,日本因素对于台湾当局政策变化及走向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正是从这个纠结出发,通过一些重要的结点来分析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的特殊性,有助于研读两者间关系的内涵。

关键词:台日法约关系;台湾的“日本情结”;日本的“台湾情结”;“钓鱼台”问题

中图分类号:D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3)01-0099-06

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在美国的撮合下与日本建交并发展了 20 年的正式外交关系。1972 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虽与台湾当局断交,但此后台湾地区与日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笔者通过归结、分析个中主要的结点,兼论“钓鱼台”^①问题的起源与纠葛,以此管窥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的特殊性,研读其中的政治意图和利益纠葛。

一、台日“法约”关系分析

从二战后至今,牵涉台湾地区与日本间的正式条约、条款主要有两个条约和两个条款,分别是:1951 年在美国主导下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与二战后日本政府签订的《旧金山对日和和平条约》;1952 年日本政府与台湾的国民政府签订的《日华(台)和平条约》;1960 年日美之间新签署的《日美安保条约》,添加了所谓的“远东条款”,涉及到台湾的保护问题;1969 年日美间的《尼克松——佐藤联合声明》增加了“台湾条款”,公开插手台湾事务。前两个条约确定了台湾地区与日本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后两个条款涉及台湾的政治定位与走向问题。

1951 年 9 月的《旧金山对日和和平条约》是二战后日本与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该条约使得日本恢复了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它标志着日本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享有与世界其它国家同样的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1](P86)}。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却有权选择据守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党政权来签约,尽管大陆的中共政权对此表示反对^{[2](P32-39)},分析其中的利害关系,可以看出美国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已经签署情况下,因应国际形势变化及反共的需要,尤其是

收稿日期:2012-10-20

作者简介:廖中武,男,政治学博士,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政治和两岸关系。

中美在朝鲜的直接交战,导致美国转而而对日本的宽待、扶持和对台的重新认可。不过,去除美国的影响因素,日本政治右翼势力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之间的多年密切关系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1952年4月28日台湾地区与日本间签订《日华(台)和平条约》,“条约在台湾地位问题上完全违背《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的有关规定,未让日本写明已将台澎等一切权力归还中国,仅将台湾称之为‘现在中华民国控制之下(的领土)’。在国际法上,‘控制’与‘拥有主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这就是说日本只承认台湾当局‘控制’台澎地区的事实,但并不意味着它同时承认中国对台澎地区拥有主权,为所谓的‘台澎地区地位未定论’和制造‘两个中国’埋下了‘伏笔’”^[3](P37)]。这是台湾地区与日本间最重要的条约,“‘日华(台)和平条约’奠定了日本与台湾地区关系的基本框架,不仅对日本与台湾地区而且对亚太地区都发生影响。可以说‘日华(台)和平条约’是战后日本与台湾地区关系的基础工程,以后二十年的‘外交’关系的基础就是在这时期奠定的”^[4](P112-113)]。该条约基本上奠定了日本与台湾地区之间官方交往的法律基础,其作用一直延续到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正常邦交为止。对于《日华(台)和平条约》签订的结果,如大陆学者陈奉林所说。“大大便利了日本资本对台湾的大举扩张,日本与台湾地区经济关系进一步加深。……原来只有通过战争和殖民开发所获得的台湾市场,现在仅凭经济手段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这也是蒋介石政权一贯以反共为目的的做法,断送的是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因此,“从根本上讲,‘日华和平条约’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该约是持反对态度的”^[4](P116-117)]。

日本在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后,日益对1951年9月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表示不满。于是日美之间在1960年1月重新签署了《日美安保条约》,加进所谓的“远东条款”,突出了保卫台湾的立场。尽管该条约被广大日本人民所反对,但仍然在日本国会得以通过而生效。^[1](P89)]根据陈奉林的研究结果,“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和新《日美安保条约》都是美国西太平洋整个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两条约有关‘远东条款’的内容都是前后照应和相互关联的”。新《日美安保条约》突出了台湾地区在西太平洋大国关系中的战略位置,成为美日制衡中国的一个砝码。^[4](P160-161)]

1969年11月的《尼克松——佐藤联合声明》尽管主要是美国总统尼克松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为了冲绳问题和安全条约问题商谈的结果,但对日本而言,冲绳与台湾紧密相连,事关日本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因而“《尼克松——佐藤联合声明》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它把‘台湾条款’明确写入其中,公开插手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对日本所为的原因,陈奉林认为,“日本始终是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视角看待远东与台湾问题的,所以佐藤在《尼克松——佐藤联合声明》中强调:‘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于日本的安全是极为重要的因素’”^[4](P163-164)]。

从以上事关台湾当局外交和国际地位及台海局势的几个重要国际法条约与条文规定的内容和结果看,在美、日合力打压、利用台湾并鱼肉其中的状况下,台湾国民党政权适应美国的战略需要,与日本签订了相关条约和条款,日本利用这些条约、条款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理顺了自二战以来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与日本当局的定位和外交关系,同时便利了日本控制、侵入台湾地区,将台湾纳入以美国为首的美日台太平洋战略防御体系的一环,观瞻当时台湾的地位与作用,台湾当局充其量不过是当时美国、日本防御战略链条中的一粒棋子,其失去的与得到的相抵,并未获得更多的自身利益。

二、日本“台湾帮”的形成与台日利益分析

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政府高层早年留学日本,与日本军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在抗战前和抗战期间还保持着某种默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恩宠”还表现在日本投降后,设法多方留下和保护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侵华日军头目,如中国战区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第一方面军司令澄田徠四郎等,后来还帮助这些原该判死刑的战犯逃避战争法的审判。即使在当时中共的抗议下、在李宗仁代总统命令要求押送这些战犯回中国接受审判的情况下,受国民政府内一小撮亲日分子的保护,这些战犯仍然安全地逃脱了被审判的命运。这些军国分子逃回日本本土后成为仇视中共政权、骨子里充浸着仇华毒素的日本右翼势力。由于这批死硬的右翼分子没被审判,没有遭到应有的惩罚,是故日本右翼势力日后不断抹杀侵华历史事实,发酵为干涉中国内政、台海事务的日本“台湾帮”。^{[2](P20-30)}

抗战结束后,为了夺取国共内战的胜利,蒋介石的对日工作,主要是以利用旧日军这股战争势力为主线展开。但后来,日本的一些与原日军上层人物有关联的战前官僚、财阀和政治家相继参与进来。为此,蒋介石也投入了庞大的资金,给予丰厚的待遇,这就为后来形成盘踞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打下基础。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政界形成“台湾帮”,“1957年2月,被称为日本‘台湾帮’开山鼻祖的岸信介在问鼎首相宝座、成立岸信介内阁后,‘台湾帮’首先在执政的自民党中形成气候”^{[1](P88)}。岸信介之亲弟弟佐藤荣作也担任过日本首相,亦是“台湾帮”的死硬分子和大佬级人物。“台湾帮”的主要成员都是一些右翼亲台反华分子,如贺屋兴宣、椎名悦三郎、金丸信、小泽一郎等,组织上有“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青岚会”等。^{[1](P91-95)}这些日本的右翼势力占据着重要的职务,组成各种协会,开展对台外交,影响台湾的政局,为日本自身获得更多的活动空间和利益而谋动。而这也跟台湾方面的“恩宠”和支持有关,像“青岚会”肆无忌惮地进行亲台反华活动就是有台湾方面提供的庞大资金为后盾。^{[5](P335)}

“台湾帮”的势力之所以能在今天的日本政坛日渐壮大,一方面是因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反华分子仍不甘心,企图借台湾问题挑起纷争;另一方面也与台湾当局的金钱攻势密不可分。为维系与如此庞大的日本亲台势力的关系,台湾当局一直都不惜血本,用金钱铺路,美色开道,不择手段地对日本各界亲台人士展开拉拢和腐蚀,扩大“台湾帮”的规模及影响。蒋介石时期对“台湾帮”的扶持、借力和利用,李登辉时期更是将台北至高雄的高速铁路等重大项目对日本企业私相授受。台湾对外贸易多是顺差,独独对日贸易呈现逆差,1993年后赤字高达130多亿美元甚至更多,对此台湾当局却不见怨言,原因就在于一种利益输送。^{[6](P11)}台当局还为“台湾帮”提供色情招待,所以对日本政客尤其是年轻议员来说,台湾“简直就是伊甸园”。据说,只要去过一次台湾的精力充沛的年轻议员,绝对还想再去第二次,且回国后马上就能变成“台湾帮”。^{[1](P97-99)}但是,“从‘亲台派’右翼的政治意识来看,台湾地区对日本的政治价值仅仅在‘反中’、‘亲日’上,其他方面日本极少顾及台湾地区。……但遇到台湾地区与日本有争执的议题——譬如‘钓鱼台’,日方是毫不客气的将台湾一军,庞大的Taiwan lobby(台湾游说议员团体)中,也不见哪位有过任何尊重台湾地区的表示”^{[6](P27)}。日本“台湾帮”的真实面目可见一斑。

从以上情况和事例可以看出,蒋介石及其政府内一帮人由于个人原因与日本军政界联系密切,而战后出于反共的需要,对战败的日军施以种种优待与恩宠,还将不少的日本战犯予以留用,免受战后的审判,通过这些日本旧军界势力,台湾地区 and 战后日本牵扯上密切的关系,在台湾当局的扶持下,在日本政界逐渐形成势力强大的“台湾帮”,左右着台日的外交关系,影响着日本对台政策和台湾的对日政策。可以说,在这对矛盾关系中,蒋介石是肇起者,而日本的“台湾帮”形成后,台湾地区又陷于“台湾帮”的布局之中,需要假借其手来进行政治幕后运作,被日本的“台湾帮”牵着鼻子走,损失的是自身的巨大利益,只能暗食苦果。

三、台湾的“日本情结”与日本的“台湾情结”分析

日据台湾时,出于对战争和台湾稳定的需要,在台湾实行“皇民化”运动。尽管台湾民众本能地予以抵制,但还是培养了像辜显荣之类的“台奸”,为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所用。蒋介石及其僚属在日本的特殊经历奠定了他们对日本的个人情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日本战犯和旧军人的袒护和再用,建立起台湾与日本的非凡关系。而当时台湾当局放弃了对日的战争赔偿要求,除了中国人的宽大和厚德外,更出于国民党台湾当局对日本的特殊需求。蒋经国主政时,虽然对日关系呈淡化势态,1982年2月的禁止日货行动给了日本当头一棒,反转了一直存在的台湾地区与日本贸易逆差状况,让日本为之担忧一番,^{[2](P60)}只是这种状况未能持续。李登辉的“日本情结”比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深受皇民化教育,如台湾当局前“外交部长”钱复所言,李登辉的“内心比现在的日本人更加日本”^{[7](P207)}。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谈话时,李登辉竟然说出自己“做为台湾人的悲哀”,认为自己在22岁前是日本人。这不得不让人感慨万分。陈水扁也是一个“日本情结”很浓的人物。他上台后,提拔、重用“亲日派”人士,对日政策承续李登辉的亲日、媚日精髓。^{[5](P345-347)}自2001年春天开始,从官方层面加大对日本的工作力度。首先在“总统府”内设置“对日工作项目小组”,2002年3月,时任台湾当局“外长”的简又新又提出推动台日高层互访等五个工作重点。^{[6](P6-7)}由于日本多年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文化去中国化和拉拢腐蚀政策,造成了一批听命于日本、亲近日本的假日本人,他们居于相当高的政位,使得台湾人中的“日本情结”有相当的影响,给台湾的政局和外交走向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日本的“台湾情结”远至清朝就有,在甲午战争后更是一口吞并了台湾及澎湖列岛等岛屿。如前所述,在中日建交前日台签订的有关重要法约,都表明了日本对台的特殊情结。而2000年台湾首次实现“政党轮替”,日方唯恐“李登辉路线”不能延续,派出不少议员、媒体赴台观察探听,对台湾的关心超凡彰显。陈水扁执政时,弊案丛生、政绩败坏,但唯独日本媒体对其呵护有加。而对2008年上台执政的马英九,日本媒体却是挑骨剔刺、吹毛求疵。个中原因在于,陈水扁有着反中亲日的情结,而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说“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被称为是“对日强硬派”。^{[8](P13-14)}因此遭遇与陈水扁截然不同。这从2006年3月的日本杂志《诸君》对马英九的横加批判就可以看出。马英九对日的强硬态度,让日本右翼势力“非常的不甚痛快”,以致对马英九的批判甚嚣尘上。^{[8](P139-144)}从这里多多少少可以看出日本的“台湾情结”是怎么回事了。

日本政界存在特殊的“台湾情结”,同时台湾一部分人也有“日本情结”,二者交织、纠缠在一起,互为作用,其基础在于二者的互相利用和企图。没有日本右翼势力对台湾的嗜好和觊觎,日本的“台湾情结”就不会发生和存在;反之,没有台湾政客对日本的“投桃报李”和别有用心,台湾的“日本情结”也就无所依附了。事实上,日本的“台湾情结”侵夺的是台湾的主权和利益,谋划的是侵吞、经略这个对其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和经济利益的地区,而反过来,台湾的“日本情结”却是这种恶因养化下的恶果,使得台湾投靠于觊觎它的“狼口”之下。如何恰当地化解台湾的“日本情结”、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确实是横亘于两岸人民之间的一个历史难题。

四、台湾地区与日本“钓鱼台”问题的起源与纠葛分析

因琉球群岛的归属,导致“钓鱼台”问题成为纠缠当代中国与日本以及台湾地区与日本的一

大难题。开罗会议时,美国总统罗斯福面见蒋介石咨询其对琉球群岛归属的意见,在这事关战后日本领土版图重划的关头,蒋介石暧昧地说先由中美共同托管、再由琉球居民决定琉球的去留。事实上,蒋介石忙于内战而无暇顾及琉球问题。尽管当时琉球有“琉球革命同志会”在会长蔡璋领导下,主张琉球重入“中华民国”版图,但与蒋介石对琉球群岛的暧昧态度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日本对琉球的垂涎。台湾学者许介鳞指出,日本“亲台”的佐藤内阁用奸使诈,用给台唯一的一笔贷款外加日美安全护佑为诱饵将琉球囊入手中,“国府当时完全忽略了,日本取得琉球,会牵涉到钓鱼台的主权问题”^[2](P47,50)]。正是由于长期的“台日情结”,台湾当局对钓鱼台归属问题态度相当暧昧模糊。“钓鱼台”距离日本琉球群岛的那霸市有 480 公里,而距离台湾的基隆仅 222 公里,根据学者的考证,历史上都将此地归属于中国所有,^②后来却被日本巧取豪夺,成为难以化解的缠结。

1968 年勘察到东海大陆架蕴藏丰富的油气资源,这让缺乏能源的日本非常动心,不断地伺机运作美国,终于让美国同意将琉球群岛归划给日本管理。^[9](P2-13)]由于日本据有琉球群岛而能守望“钓鱼台”,悍然将此岛囊入其版图中,对台湾渔民到该海域作业采取了阻挠、驱赶、罚款、扣押人质等的霸道做法,并在钓鱼台岛上安置灯塔设备等,并不断进行海底资源勘探,引发了海内外中华爱国同胞的强烈抗议,要求到钓鱼台宣示主权,自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开始形成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可见,“钓鱼台”问题的矛盾纠结于主权及其附近资源方面。

从台湾当局领导人对“钓鱼台”归属的态度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日本的“台湾情结”与台湾的“日本情结”到底是怎么回事。1967 年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为了从美国手中索回琉球而访台,蒋介石试图以支持日本索回琉球的谋求来换取日本对台湾的支持和反对中共,然而事实再一次证明国际关系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仅过了 5 年,日本为了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就与台湾断交,“田中和大平之所以宁肯丢掉老朋友台湾,也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并不是由于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情有独钟,更不是为了照顾中国的利益。而恰恰相反,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5](P241-242)]。李登辉由于亲日,说出了“钓鱼台是日本的领土,台湾只有渔业权”的怪论^[8](P63)]。按李登辉的论调,台湾人到钓鱼台进行渔业捕捞变成了私自侵犯日本的领土主权。陈水扁上台后,出于反中的需要,不断加强与日本的来往,台日关系得以进一步密切。大陆学者巴殿君认为,“在陈水扁时代,日本国内右翼党团更是给予民进党极大的便利。谢长廷、金美玲等‘台独’大佬,都曾经利用日本提供的平台进行密集的分裂活动”^[10](P86)]。李登辉、陈水扁亲日的软肋被日方抓住并吃定,即使吃了亏也不敢吭气。马英九因为参加过“保钓”运动,其博士论文写的就是“钓鱼台”问题并一贯主张钓鱼台属于台湾。马英九上台执政后,出于执政的需要,采取“友日”取势,然而由于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台而导致的主权、渔权危机,马英九亦采取较强硬的态度予以回应。

从上可以看出,“钓鱼台”是个牵扯到中、日、美及台湾地区四方的问题,战后会演变成今天这个局面,‘始作俑者’是美国,而 1972 年 5 月之后,美国把问题一丢,留给中国、日本去争,美国则是隔岸观火伺机继续操弄东北亚的国际政治”^[6](P86)]。

五、结语

自甲午战败以来,日本侵占了台湾岛与澎湖列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的开始使得日本尽管作为战败国,却没有受到彻底的清算。日本通过《旧金山条约》取得了合法的国际地位,而台湾地区又位于日本所谓的“海上生命线”的关节点上,更被日本所看重,是故日本尤其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而又强大的中国的出现,对台湾打着种种诡异的

算盘,使得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出现种种吊诡的现象。

本文仅从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中几个重要结点的提炼和梳理,来审视当时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下,由于台湾地区与日本政治人物牵扯不断的关系和利益需求,使得台湾地区与日本在试探中接近。在美国出于战略利益的撮合和打压下,台湾地区和战后日本走在一起,签订了相关条约条款,奠定了二者间所谓的正式外交关系,并形成了相互间的“情结”。中日恢复正常邦交后,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并未因此而中断,日本的“台湾帮”和部分台湾人心中的“日本情结”还在遥相呼应。但经济利益始终是政治脉动的根本动因,一切政治运作都能在经济利益的根源中找到发生的理由。一碰到像“钓鱼台”归属这样的主权与利益问题,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的真面目就暴露无遗。日本由于特殊的地缘和经济因素高度关注着台湾地区的政局发展,日本的右翼势力尤其不愿意看到两岸的统一,企图在其中发挥着阻碍作用,而“台独”势力也利用日本的右翼力量来抗拒两岸的统合。可以说,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如何定位和协调事关中日关系发展、台海安全局势乃至台湾政局变化,日本的因素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我们在研究台湾问题时不能不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注释:

①“钓鱼台”群岛即钓鱼岛群岛,由8个大小岛礁组成,其中一座岛屿面积最大,中国大陆称其为钓鱼岛,本文以台湾民众的习惯将钓鱼岛称为钓鱼台。

②对钓鱼台历史发现和归属问题的考证,日本学者井上清、香港中文大学学者郑海麟等都做过翔实的考证,见井上清著《钓鱼岛:历史与主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和郑海麟著《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增订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井上清明确指出“钓鱼群岛不是像台湾那样根据和约公然从清朝抢过来的,而是乘着战胜之机,不缔结任何条约,也不进行谈判,偷偷从清朝窃取过来的”(井上清著:《钓鱼岛:历史与主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钓鱼群岛原本并非无主地,显然是中国领土。‘无主地先占为主’的法则本身就不适用于该岛”(同上,第130页);郑海麟更是从历史上和国际法视角提出和阐明了钓鱼台属于中国的有力证据。

参考文献:

- [1]卢晓衡.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台湾问题[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 [2](台)许介麟.“对日外交”:盲点在哪里? 蒋介石、蒋经国时代[M].台北市:文英堂出版社,2009.
- [3]张景旭.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的焦点[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 [4]陈奉林.战后日台关系史[M].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04.
- [5]张耀武.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 [6](台)李中邦.日本如何做两岸间的第三者[M].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6.
- [7]刘德久,魏秀堂,卢新德等.解读台湾[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2000.
- [8](台)李中邦.日本影响两岸关系的 know-how——官民两手相互为用与国际政治谋略[M].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9.
- [9]张平.钓鱼岛风云[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 [10]巴殿君.冷战后日本对台湾政策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蓝剑平]